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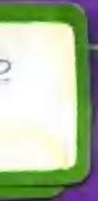
河西开发研究·河西开发研究·河西开发研究

河西开发研究

莫廷桢、郭厚安 主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

古代卷

河西



何陋床家臣史

何陋床家臣史

河西开发研究

古代卷

主编 吴廷桢
郭厚安

甘肃教育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04号

河西开发研究

(古代卷)

顾问 钟永棠

主编 吴廷桢
郭厚安

本卷作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永曾	田 澍	刘进宝
刘建丽	李清凌	侯丕勋
赵向群	潘 策	魏明孔

河西开发研究

(古代卷)

吴廷桢 郭厚安 主编

甘肃嘉禾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5 插页2 字数300,000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423-0371-6/K·32 定价:8.00元

序

钟永棠

由于河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以及在政治上、军事上和中西交通方面所占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的中央王朝以及若干地方割据政权都十分重视对河西的开拓和开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河西的开拓、发展和繁荣曾经是河西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后因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特别是民族纷争、战乱频仍等等原因，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衰落下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河西地区获得了新生，社会经济有所发展。然而，由于沉重的历史背负，步履不免蹒跚，未能尽如人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西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比起东南沿海地区来，差距仍然很大。

为了焕发出河西的青春活力，使其在我国改革与开放的大潮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很有必要认真回顾总结历史经验，继往开来，以便能更加富有成效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河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今日的河西，由历史的河西演进而来。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遗产。这些历史遗产之所以珍贵，在于它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先辈们奋斗的成功业绩，更主要地是给了我们诸多的历史启迪。对于历史遗

产，不管我们主观上是否愿意，它都将无可选择地被我们承继下来。这里所谓的“承继”，既包括成功与进步，也包括挫折与失败；既包括宝贵的历史经验，也包括沉痛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些历史遗产加以审视、研究和总结，从而揭示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以供今日发展河西经济的借鉴，是责无旁贷的义务。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廷桢和郭厚安两先生主持撰写的《河西开发研究》一书，是对这种义务的一个尽责，也是一个奉献，他们的这种孜孜不倦地做这种看来似是冷门学问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河西开发研究》分为古代卷和近现代卷。它系统而全面地描述了河西开拓、发展、繁荣、衰落以及新生的变迁。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对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水土保持、生态平衡以及人口、民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相关的社会、自然诸因素的协调制约关系及其内在规律。它用历史材料进行纵向的对比分析研究，从而总结出了有益的、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它把对河西这一地区的区域经济研究和地方史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甘肃地方史和甘肃经济史的综合研究中，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河西是甘肃尚待进一步开发的一块宝地。这里日照充足，地势平坦，水利设施基础雄厚，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优越；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投资回收率高，自我发展能力强，工业发展前景广阔；前途十分光明。我们期待着《河西开发研究》对河西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前 言

河西的范围，随历史发展有所不同。本书采用汉唐界说，指今日甘、青两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总面积28万多平方公里。由于这一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对于巩固西北边防、加强西北与中原的联系以及疏通中西交往等方面，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在河西设郡起到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止的1962年的漫长岁月中，历代中央王朝和若干地方割据政权，都十分重视对河西的经营开发。虽然其经济发展随着王朝或政权的更替有高低起伏的变化，即使同一王朝或政权的统治，前后期往往也有兴盛衰落的差别；同时随着历史的推移，河西经济发展的格局，也不完全一样；但是，从宏观上看，西汉到晚清的一千多年中，河西社会经济，仍可大致划分为开拓、发展、鼎盛、衰落、恢复与缓慢发展五个历史时期。

开拓时期：汉武——三国

汉武帝派霍去病出征河西击败匈奴后，即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设武威、酒泉两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再设张掖、敦煌两郡，同时移民实边，厉行屯田，河西的开发从此开

端。在中西交通方面，张骞凿空西域，并随之修长城，筑亭障，并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又置西域都护，保护丝路畅通和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而为河西经济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继而大将军窦融出镇河西，政治上抚结群雄，怀辑羌人，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生产上积极开发农牧经济。曹魏称雄后，在河西平定动乱，清吏治，抑豪强，移风易俗，整治了社会秩序，同时招抚流民，改进农技，开发农牧业，疏通中西贸易，结束了汉章帝以来由于民族关系紧张和丝路三绝三通等原因导致的社会凋敝，河西经济又呈现出一派振兴景象。

发展时期：西晋——隋

这一时期，主要是五凉、西魏、北周等割据政权和统一的隋王朝在两汉开拓的基础上对河西社会经济的经营和发展。

五凉政权的保民安境政策，为河西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以此为前提，注意人口、土地、水利、手工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并加强交通西域，与此同时，统治者敦崇儒学，振兴学校，倡导民间讲学和私家著述，经史、文哲、科技等盛极一时，河西的经济文化欣欣向荣。

北魏入主中原，战灭北凉，结束中国北方长期分裂割据局面后，即致力于河西地区的经营。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开发河西的方针和实际步骤，特别是“本五方之民各有其性”的原则，实行“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廩，收其货物以实库藏”的具体做法，政治上颇得人心，经济上把管理、开发、征调结合起来，极大地促进了河西经济的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北魏对河西的开发，改变了两汉以来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执行农牧并举的方针。在重视农业经济的同时，

大力挖掘畜牧业资源，专设官营牧场以司其事。到了太和年间（公元477年—公元499年），畜牧业臻于极盛，河西成为中原战马、牛羊、皮毛的供给地；北魏军事实力也因此而益强，并为隋唐在河西设置官营马牧，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西魏、北周的统治者注重实务的社会改革措施，并在河西普遍推行均田制，推动了河西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

隋文帝杨坚建立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后，对于雄踞西北地区的突厥、吐谷浑，实行“离强合弱、远交近攻”的决策，军事进攻与政治怀柔双管齐下，消除了西北的边患，同时加强河西的民政建设，为河西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基本的政治前提。接着，在河西大兴屯垦，发展畜牧，积极开展民族贸易和张掖互市，重视文化教育工作，河西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呈现出两汉以来的新高潮，为唐代河西开发史上黄金时期的到来，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此外，随着隋王朝的张掖互市，河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武威西移到了张掖，当时的张掖堪称万商云集的西北商业中心，成为对外贸易的窗口，使河西农业经济因注入了一定的商品经济的成分而增强了活力，隐约地反映出河西经济发展的新趋势。这是北魏农牧并举后河西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格局。

鼎盛时期：唐高祖武德——玄宗天宝

安史之乱前的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漫长历史中的鼎盛时期。与全国形势相适应，这一时期也是河西开发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王朝对河西的经营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主要的有：

1. 削平薛举和李轨的割据，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加强防戍，有效地维护了河西地区的安定。

2. 大规模屯田，制订了一套完备的屯田管理制度和办法。

开元间（公元714年—公元741年），河西地区有98屯，占全国992屯的9.9%；屯田面积约计50万亩，亩产粟147.5市斤，麦158市斤，产量较两汉增长32—34%；较前凉增长12.6—13.1%；屯兵共73000人，约占当时河西近19万在编人口的26.2%。屯田规模巨大，成就卓著。此外，还有规模较小的民屯。

3.推行均田制、和籴法，设置常平仓。天宝年间（公元742年—公元756年），河西共有居民35818户，可贡献粮食6468万市斤以上。唐代的和籴法，有力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唐政府从河西籴粮371,751石，居全国各道之首，占当年全国和籴粮总数的32.6%；常平仓储粮1,633,700石，占全国各道常平仓总储粮的36.1%。

4.狠抓水利建设，渠道纵横，形成完整的灌溉网络，同时有一套齐全的水利管理机构 and 制度，敦煌遗书中的《开元水部式》残卷，即唐代在河西的水管法规。

5.丝路畅通无阻和政府对市场的有效管理，促进了河西商品经济的兴旺，从运行机制上推动河西的社会生产。

通过以上的综合治理和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协调发展，中唐出现了“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间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的壮观场面。河西成为当时全国最富裕的地区。

衰落时期：中唐——明

这个历史阶段内相继经营河西的主要是西夏和元、明两个王朝。河西社会经济所以衰落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的。

安史之乱以后，历经宋、元、明的前期，整个河陇地区民族角逐，战乱不已。西夏是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战争才统一河西的。

西夏政权确立后，采取了许多恢复河西社会经济的措施，但因多年战乱，社会凋残，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成效不著。继而蒙古汗国又举兵征伐西夏；明永乐以后，国势衰微，番部“寇掠无时”，硝烟频仍，破坏极大，河西地区又陷入困境。元、明两朝曾在河西推行重农政策，采取相应的实际办法，诸如兴屯田、修水利等，农牧业有所复苏，然而随着王朝后期的日益腐朽，吏治败坏，巧取豪夺，经营开发每况愈下，河西社会经济的衰退更加加剧了。

其次，元明之际，中外交通多从海上丝路，途径河西走廊的陆上丝路，已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加上明代出于边防的考虑，有时还主动关闭嘉峪关。中西交往的不景气，直接间接的影响了河西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西夏和蒙古都是以氏族社会的历史阶段入主西北和中原的，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及其意识形态，无疑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第四，明王朝在河西的屯田和茶马互市，是本于“耕战一体”和边备需要，并非着眼于发展农牧，繁荣经济，造福社会，因而限制了河西开发的成就。凡此种种，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直到明末清初河西社会经济的衰落。著名史学家马端临说：“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虽然有所夸张，但也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

恢复与缓慢发展时期：

清顺治——道光

清王朝建立后，在河西设置甘州、凉州二府，肃州、安西二直隶州以及若干县厅，遣官驻军，进行统治，以安定社会，抚辑黎民。继而改变初期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代之以镇压与

怀柔相结合、防犯与扶助相结合，调整民族关系。与此同时，推行了许多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其中在河西推行最力、收效最大的是屯田垦荒政策。诸如招抚流亡，优惠开荒，奖励士民垦地，计兵授田，实行军屯，以及扶助生产，救济灾荒，兴修水利，建成完备的灌溉网络，并建立严密的水利管理制度，改进灌溉技术等等，都是屯田垦荒政策的具体贯彻。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几代统治者的经营，河西地区的屯垦和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家给人足，莫不欣欣乐业”的喜人景象。清政府从肃、甘、凉等州府屯田所得的粮料，占当地税收总额的一半。

清代河西的畜牧业虽比不上前代的规模，但顺治初期曾在甘州等地设茶马司和监牧地，凉、甘、肃三州的官牧有所发展。后来河西牧监撤销，而当地的自然饲养条件和居民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促使河西各族人民莫不以牲畜饲养作为主要收入之一。因此，亦农亦牧，依然是河西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畜牧业也在发展之中。

令人瞩目的是，清代中叶河西商品经济相当活跃。据记载：凉州属县武威，“商拥高资者寡，而开张稠密，四周坐卖无隙地”。甘州府既有市内交易，又有集镇贸易，既有钱物交易，也有实物交换。张掖县有炭、菜、木头、房笆、油、麻渣、苇席、骡马等贸易市场，还有栉比鳞次的店铺，出售布、絮、裘、褐、毛、皮及铜、锡、铁等日用品。肃州“番夷云集”，“市之鬻贩不拘时”，“各省商旅，咸集于此”。当时河西与内地的贸易，东到鲁豫，北及晋冀，南达荆扬，是内地与新疆联系的纽带，促进了内地与新疆乃至与中亚、西亚、东欧经济文化的交流。“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生产的历史前提”（《资本论》卷一第167页）。河西市场的活跃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透露了当地千百年来自然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

古代河西开发的得失和社会经济的兴衰，虽然各个时期都有

自己的特殊原因，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特殊的具体现象的深层，包藏着普遍的规律性的内涵，正是这些规律性的内涵，为河西地区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西汉到晚清一千多年的河西开发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社会安定是经济开发的基本前提。

纵观西汉击败匈奴，设立四郡，置西域都护；东汉安抚群雄，怀柔羌人，明烽火之举；曹魏定动乱，整吏治，抑制豪强，移风易俗；五凉保境安民，北魏优复新附等等，无一不是着眼于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作为经济开发的必要前提。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开发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唐朝成为河西开发史上的黄金时代，关键就在于它在前人的基础上，削平割据，平定党项、羌人、吐谷浑、突厥、吐蕃的分裂活动，维护了多民族的统一与安定，并加强防戍，赢得了河西的良好政治环境，从而出现了两汉以来河西经济开发的最高峰。

反之，安史之乱到明末，河西经济一度衰落，归根到底，还是安定与否的问题。诸如吐蕃与晚唐的连年战争，吐蕃奴隶主的残暴统治，蒙古铁骑在河西的践踏，明中叶以后西北地区的烽烟迭起，使得河西社会动荡不安。在此情况下，自然谈不上经济的开发与发展了。

二、和谐相处的民族关系是社会安定的政治基础。

河西地区历来是多民族和部落活动的场所，社会是否安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民族关系反映出来的。民族之间的不协调，不仅是统治者挑拨离间等直接导致流血冲突，也可以由某些间接因素诱发出矛盾和纠纷。例如徙民实边，奖励垦殖，耕地面积扩大了，牧区自然也就缩小了。因而就可能破坏农民和牧民，亦即汉民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因此，全方位多层次的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窦融等人在这方面有比较成功的经验。

三、符合实际的政策和科学管理体制是经济发展的可靠保证。

政策是指导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准绳，因而必须符合实际，必须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否则，理论脱离实践，政策脱离实际，必将一事无成，甚至带来严重危害。史家所以称赞前凉张轨“化行河右”，“威著西州”，就是因为他推行了一套因地制宜的政策，使河西的经济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又如西魏、北周把关陇本位政策作为处理军国大事的着眼点，这个政策在河西是重视实务的社会改革措施，尤其是普遍推行均田制。再如西魏大丞相宇文泰抓住要领，把清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等六项作为各级官吏必须遵守的准则，中心内容是澄清吏治和减轻赋役。这些规定，实际上是针对北魏暴政和当时民情提出来的，对于河西经济开发曾发挥过积极的影响。

同样，经济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千头万绪，没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是无法总揽其成的。关于这点，唐代的《开元水部式》和清代的水利管理，给予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四、社会、经济、科技的协调发展，是经济开发的关键环节。

作为工农业等社会生产收入的国民经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先进还是落后的尺度。国民经济总量的多少或经济指标的高低，又为社会各种相关机制所制约，人们把它表述为社会、经济、科技的协调发展。科技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作用于经济的增长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人的社会关系之总和的社会，结构和内容十分复杂，尤其是上层建筑的观念部分，即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教育等意识形态，一方面，它对生产和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巨大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它本身不仅有抽象性的特点，而且同社会生产没有直接的联系，它对生产力的

作用，是通过基础的中介和折光来实现的。因此，人们往往可以直接觉察到社会生产、经济指标的具体成果，容易忽略隐藏在生产力、社会生产和经济实体中的精神因素，对于这些精神因素特有的作用重视不够，甚至态度冷漠。一句话，不能正确理解和处理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纵观一千多年的古代河西开发史，统治者对徙民实边、奖励垦殖、兴修水利、发展畜牧等，都是十分积极的。然而对开发科学技术、振兴文教、致力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除五凉政权独树一帜，取得当时北方文化圈中的领先地位，相应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并为隋唐的文化繁荣奠基外，其余各代，几乎无足道者。诚然，这里有历史局限性问题，不可以苛求于前人，但作为历史教训，却是非常深刻的。

五、保护丝路畅通是河西经济繁荣的重要途径。

古代中国的国际贸易通道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唐以前，陆上丝路的畅通超过海上丝路。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内地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但规模大，时间连续不断，是在张骞凿空之后。不但是中国丝绸的外输之路，而且把中原古老农业区和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接起来，并进而与中亚、西亚、南亚的农业区也连接起来了。从而为它的畅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又促进了国际贸易与内地贸易、民族贸易和物质文化交流的正常进行，推动了河西地区物质与文化的发展。中唐以后，陆路衰落，海路日益兴旺。不过，即使如此，陆路对河西经济的盛衰，仍然关系重大。元、明、清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六、水是河西开发的决定性自然因素。河西地区降雨量特少，除个别地方外，年均降雨量只有34—196毫米，而且多集中在6—9月，约占全年降雨量的70%，春季降雨量仅占15%左右，雨水降落和作物需要极端不平衡。反之，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水源是祁连山高峰的冰川和积雪。据现代科学探测，

祁连山冰川和积雪贮水量为1200亿立方米，每年春夏之交，冰川雪峰融化，从祁连山口径流和潜流的水量，合计70多万立方米，汇成50多条河流，可以说，河西的农林牧全靠这些河流的灌溉和养育。汉武帝的河西屯田，多分布在有水草的地方。尽管如此，仍然动员了大批人力，兴修水渠，引水浇田，并为此而设置了专门从事治渠引水的“河渠卒”。唐前期在河西的耕地总面积达到330万亩，分别相当于1944年河西耕地面积565.98万亩的58%和当前河西耕地面积923万亩的35.7%，所以如此，从自然因素来看，主要是致力于水利开发，建成了相当规模的灌溉网络和制订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水利管理制度。

清代的情况也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河西被指定为国家商品粮基地以后，河西水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取得了显著成绩。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八十年代达到900多万亩，接近唐代在这里的耕地面积的三倍。但是，河西还有荒地2000万亩，其中宜农荒地570.9万亩，宜牧荒地863.3万亩，宜林荒地331.1万亩^①。今后河西面临的水利建设的严重任务是：1.科学控制和利用祁连山的自然水资源，把冰雪融化的自发性转变为自觉性；2.科学管理和使用地上水，诸如改革灌溉系统和技术，妥善解决储水与用水问题，计划安排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调整农作物结构等等；3.地下水的开发与利用。

历史是一条悠悠不尽的长流，今天的历史是古代历史的继续与发展，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观今宜鉴古。认真研究古代河西开发史，科学地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河西，必将大有裨益。这就是我们从事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所在。

本书是集体协作的成果，各章撰写人员如次：

^①中科院兰州图书馆情报研究室编《开发建设河西地区论文汇编》第197页。

潘 策	第一章
侯丕勋	第二章
赵向群	第三、四章
魏明孔	第五章
王永曾	第六章第一、二、三、四、五、六、八节
刘进宝	第六章第七节
刘建丽	第七、八章
田 澍	第九章
李清凌	第十章

吴廷桢、郭厚安制定大纲并统一了全部书稿。

本书顾问、省委党校钟永棠校长对书稿编写给予积极支持和指导，校阅了初稿，还为本书撰写序言；甘肃省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韩正清等领导同志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本书的编写和出版；甘肃教育出版社的同志们为审查书稿和此书的问世付出了大量劳动，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的理论、专业水平有限，对河西经济开发的钻研也是刚刚起步，书中难免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深切盼望读者和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编者

1992年8月 兰州